



從《東寧政事集》

考察清領之初的台灣社會問題

王玉輝*

* 王玉輝 現職國立屏東高中國文科專任教師兼社團活動組長，目前就讀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相關著作：（一）碩士論文：〈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和詩人之研究——以旗津吟社為例〉；（二）期刊論文：〈梁山集團替天行道的意義〉（《屏中學報》第11期，2003.11）、〈淺談詩人縣長陳皆興詩作內容〉（《屏中學報》第14期，2006.12）；〈沈光文寓台詩歌風格的轉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問學》第11期，2007.6）；〈旗津吟社創社初期（1921-1926）的漢學功能〉（《高市文獻》第20卷第3期，2007.9）（三）研討會論文：〈日治時期傳統詩社的漢學功能——以旗津吟社為例〉（第三屆環中國海漢學研討會，淡江大學，2007.6.29）。

提要

季麒光《東寧政事集》係其在諸羅縣令任上往來的各種文書檔案，包括稟文、告示、信箋，以及判案的審語等，共計五十篇。由於季氏為清代首任諸羅知縣，從《東寧政事集》內容可以觀察到清領之初諸羅縣的社會實況，允為研究明鄭末期和清領初期台灣社會的第一手史料。

本文共分六節，分別為「前言」、「生年及在台時間之考察」、「《東寧政事集》呈現的賦稅問題」、「《東寧政事集》呈現的社會風氣問題」、「《東寧政事集》呈現的番政問題」和「結論」等。第二節考察季氏生年和在台時間長度，以釐清歷來方志史料疏漏和不足之處；第三至五節則從「社會考察」的角度出發，探討當時台灣社會所呈現的賦稅、社會風氣和番政等問題。在賦稅方面，呈顯當時賦稅過重和權貴占田等現象，其中尤以權貴占田所造成的社會問題為甚；從社會風氣方面，可以看到在台灣早期移墾社會型態之下，所產生的不良風氣和影響；在番政方面，透過漢人加諸在原住民身上的苛政和衝突，可以窺得強勢文化逐步侵蝕弱勢文化的過程。

關鍵詞：清代台灣社會、東寧政事集、季麒光、諸羅縣

一、前言

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以下略去西元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軍征台，澎湖海戰，鄭軍失利，鄭克塽削髮獻表。清人克台後，原「欲墟其地」，經過一番論爭，以施琅力陳台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¹於是決定留下台灣。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在台灣設一府三縣，隸福建省。一府即台灣府，三縣由北至南分別是諸羅縣、台灣縣和鳳山縣。

三縣所轄區域，以諸羅縣最廣，其地原為鄭成功時期的天興縣，鄭經嗣位後，陞縣為州，並設安撫司，號「北路」。²入清後，「設縣治於諸羅山，因以命名，取諸山羅列之義也。縣隸台灣府，地南自蔦松、新港，東北至雞籠山後皆屬焉，極海而止。」³文中「蔦松」和「新港」，即今日台南縣永康市鹽行地區的蔦松里以及新市鄉一帶。以現在的行政區域而言，從台南縣永康市北端和新市鄉一線往北延伸，包括台灣東部，概屬康熙年間諸羅縣的範圍。⁴

今人欲瞭解清領之初諸羅縣的社會概況，可從志書、官方頒佈的律令、私家著述、或契約文書等相關文獻資料，加以爬梳整理，亦可從近代學者的田野調查成果，或針對各種族群及主題所作的研究著手。其中要以季麒光所著《東寧政事集》為代表性的著作。

《東寧政事集》係季麒光在諸羅知縣任上往來的各種文書檔案，包括稟文、告示、信笥，以及判案的審語等，其中還有一篇〈附上將軍施侯書〉，凡五十篇。書前有牌記一頁，題有：「東寧政事集，周又文先生鑒定，世綵

1 見施琅，《靖海紀事》（台北市：台灣銀行，1958），頁62。

2 見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建置》（台北市：行政院文建會，2005），頁75。

3 見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建置》，頁76。

4 雍正元年（1723），析諸羅縣虎尾溪以北為彰化縣。

堂藏稿」字樣。卷首則有「內侄紫山鄭廷桂」所作〈東寧政事跋〉乙篇。本文所據版本，乃西元二〇〇五年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李祖基整理自上海圖書館所藏《蓉洲詩文稿》，⁵從中選出與台灣有關的詩作與文章，分別編為《蓉洲詩稿選輯》、《蓉洲文稿選輯》和《東寧政事集》一併刊出。⁶此外，在福建省圖書館和廈門市鄭成功紀念館，則分別藏有《東寧政事集》的刻本和抄本各一部，從《明清台灣檔案彙編》中亦可以析出《東寧政事集》五十篇作品。⁷該書在篇名之後，均附有寫成的推測年份。然而，李祖基所編版本和《明清台灣檔案彙編》，有九篇在篇名上略有出入，茲整理成表並附錄於後（附表一），以供參考。

從《東寧政事集》所記內容，可以窺得清領之初諸羅縣的社會概況，是一極具史料價值的參考文獻，同時也是觀察清領之初台灣社會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本文以「社會考察」為主題，試圖從中整理歸納並論述當日所呈現的諸多問題。

二、生年和在台時間之考察

季麒光，字聖昭，號蓉洲，江蘇無錫人，康熙十五年（1676）進士。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福建閩清縣移知諸羅縣事。據現存史冊及方志記載，其生卒年均未詳。然而，從季麒光的詩文稿資料可以推估其生年及在台時間。

（一）生年時間

5 〔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烏絲欄，白口，無魚尾，宋體，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

6 〔清〕康熙刻本、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 東寧政事集》（無出版地，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為行文方便起見，以後註釋提及《東寧政事集》時，一律簡稱為《政事集》。

7 見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撰，《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貳輯第九冊（台北市：遠流，2004），頁64-155。

季麒光的生年約在明崇禎八年左右（1635），其證有三，分別條述如下。

其一，其友秦松齡有言：

余與蓉洲自戊子同賦採芹將五十年，憶是時皆在垂髫，即以兄事蓉洲。午未之後，余弱冠，幸廁禮闈，讀書中秘。⁸

戊子為清順治五年（1648），午未應指甲午、乙未，即清順治十一、十二年（1654、1655），據此推論季麒光生年可能在西元一六三四年或一六三五年之間。

其二，季麒光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撰〈華蒼崖傳〉時，言及：

（按：蒼崖）與余叔姪定交在三十年之前，時余方弱冠，以師道友蒼崖。⁹

自云三十年之前「方弱冠」，則季麒光生於西元一六三五年前後，頗為合理。

其三，季麒光在〈詳請署印文〉云：

正月十六日（按：康熙二十四年，1685），忽接家郵，慘聞親訃，子年半百，無父承歡，親壽七旬，無兒送老。¹⁰

從文中得知，季麒光是年約五十歲，據此推估其生年亦為西元一六三五年前後，也就是在明崇禎八年左右。

（二）在台時間

歷來方志對季麒光知諸羅縣的時間皆有類似的說法，謂其「二十三年（按：康熙）任，二十四年，以憂去。」¹¹此說容易誤導後人，或謂季麒光

8 見秦松齡，〈小序〉，引自〔清〕康熙刻本、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 東寧政事集》之《蓉洲詩稿選輯》，頁5。為行文方便起見，以後註釋提及本書時，一律簡稱為《詩稿》。

9 見季麒光，〈華蒼崖傳〉，引自〔清〕康熙刻本、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 東寧政事集》之《蓉洲文稿選輯》，頁124。為行文方便起見，以後註釋提及本書時，一律簡稱為《文稿》。

10 季麒光，〈詳請署印文〉，引自《政事集》，頁214。

11 如高拱乾之《台灣府志》、劉良璧之《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以及連橫之《台灣通史》，皆有類似說法。

僅在台年餘，甚至不滿一年就離開台灣。在其詩文資料中，可以考察出季麒光「抵台」和「去台」的時間。針對季麒光「抵台」的時間，茲舉例證如下。

其一，沈光文在〈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有云：

甲子，先生（按：季麒光）從梅溪令簡調諸羅。仲冬八日，舟入鹿耳門。¹²

甲子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仲冬八日」為十一月八日，可知季麒光在康熙二十三年的十一月八日從鹿耳門進入台灣。

其二，季文〈詳請署印文〉亦云：

二十三年，蒙各憲謬以才能，簡調諸羅，八月初六日啟印，十一月初八日到任。¹³

從季麒光自己的說法，他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八月六日正式成為諸羅縣令，而在三個月後的十一月八日到達台灣，與沈光文所記日期相同。因此，季麒光「登陸」台灣的正確日期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底的十一月八日。

而「二十四年，以憂去」之說，非指其因守制而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離開台灣，正確的說法是因守制「去職」而非「離台」。因為季麒光正確離台時間要遲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茲舉數端以證。

其一，邵欽衡〈送蓉翁季明府渡海序〉云：

歲之丁卯，謬辱鳳山楊明府不以衡鄙陋，以禮見召，衡義不獲辭，渡海而來，喜從楊明府，而因得朝夕以受公之教也。公方丁外艱，諸民以借寇得留代，今事畢將還。¹⁴

丁卯為康熙二十六年（1687），可知季麒光離台年份為康熙二十六年

¹² 見季麒光，《詩稿》，頁1。

¹³ 季麒光，〈詳請署印文〉，引自《政事集》，頁214。

¹⁴ 季麒光，〈送蓉翁季明府渡海序〉，引自《文稿》，頁78。

(1687)。

其二，沈光文在〈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文末署名「康熙丁卯孟夏望日，甬上年家教弟沈光文題，時年七十有六也」。「孟夏望日」即四月十五日；同書季麒光有詩〈丁卯元旦和斯菴〉，¹⁵因此確知至少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十五日之前，他仍在台灣。

其三，季詩〈將發東寧自紀〉為離台前所做組詩十首，其五有「三年踪跡悞儒冠」，其十有「三年風雨淚沾衣」¹⁶等句，屢言及「三年」之數，季麒光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抵台，三年之數正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

其四，季詩〈海行雜詩〉亦為離台前所做組詩八首，其一〈風阻安平鎮〉有云：「三更獨客淚，五月一樽秋。何日歸帆便，輕裝渡海頭。」其七〈將抵廈門〉亦曰：「三年波浪裡，猶自未封侯。」¹⁷〈風阻安平鎮〉可知他渡海時間在五月，此前已述及季麒光「孟夏望日」仍在台灣，故渡海當在此之後，符合本詩所述時間。〈將抵廈門〉亦提及「三年」，再次說明他在台的時間長度。

綜上所述，季麒光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八日抵台，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以後離台，在台時間約二年六個月。「三年」之數，詩人取其整數耳。

季麒光既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去職，何以滯台年餘方離台？這點從其作品及其他檔案資料可以窺知原因。

季麒光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十六日聞父喪，「即於十七日具文申報府、道，懇恩回籍守制。」¹⁸另外，在〈陳明賠累文〉又提到：

15 見季麒光，《詩稿》，頁47。

16 分見季麒光，《詩稿》，頁59、60。

17 分見季麒光，《詩稿》，頁29、30。

18 季麒光，〈詳請署印文〉，引自《政事集》，頁214。

卑縣荷蒙提拔調補海外，即遭大故，強留候代，十有八月，務以安番輯民為主，……獨俸工一項，……在卑職已發之銀無從抵補，遂將二十五年（按：康熙二十五年）春秋兩季俸工以半解給各衙門員役，以半少抵二十四年之苦。……不意離任後又奉道、府面諭，將二十五年俸工留為藩司項下部費。今交盤正項已得明白，而不能脫然渡海者，實此各項賠墊。……卑職已經謝事，賠者無從補，給者無從追，……伏乞憲台開天地之慈，俯賜救援，庶可望玉關生入。¹⁹

從上引文可知，季麒光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以守制為名求去，卻被上司「強留候代，十有八月」。據此推斷，季麒光當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月左右才真正卸任，與方志所記其繼任者樊維屏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到任，²⁰時間吻合。因此，方志云季麒光「二十四年，以憂去」，應該是指季麒光在康熙二十四年正月雖然「去職」，但卻「等候」並代理知縣一職長達「十有八月」。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八日到任算起，前後共「任職」諸羅知縣約二十個月。然而，繼任者到任後，季麒光又延宕將近一年始去，卻是因為「挪用」康熙二十五年（1686）公款以支應上一年衙門員役薪水的問題而受到連累，以致於遭到上司盤查有無貪瀆之情事。待查明事情的來龍去脈後，季麒光才得以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渡海離台。由此可見，清領之初諸羅縣財政惡劣的情況，甚至連基層公務人員的薪水還出現「寅食卯糧」的現象。離台時，季詩〈將發東寧自紀〉其九有云：

經營瘡癘未稱賢，況復栖遲又一年。整日向人曾乞米，臨行重索買船錢。²¹

19 季麒光，〈陳明賠累文〉，引自《政事集》，頁234。

20 參見高拱乾之《台灣府志》、周鍾瑄之《諸羅縣志》、劉良璧之《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21 見季麒光，《詩稿》，頁60。

長年苦心孤詣地經營海外荒服，卻又無辜受累而滯台一年。滯台期間，經濟陷入困境，最後連渡海的船資還必須向人索借。季麒光離開台灣時，心中應該是頗有感慨的。

三、《東寧政事集》呈現的賦稅問題

從季麒光《東寧政事集》的篇章，可以從中析出當時台灣社會存在嚴重的賦稅問題，其中可分別從「賦稅過重」和「權貴占田」等兩項加以探討。

（一）賦稅過重

諸羅縣賦稅過重的情形，可以從田賦、丁銀和其他雜稅等三項來看，以下分別討論之。

1、田賦

由於季麒光知諸羅縣之前，在福建閩清已有為民父母的行政經驗，因此對賦稅有特別深刻的體會，他認為「今日職守之最重者，莫如國賦。」²²是以在《東寧政事集》中，以論及賦稅的篇章最多，共計有十五篇。而他在〈再陳台灣事宜文〉亦指出治理台灣有三大患，第一項便是「賦稅之重大也」，而諸稅之中尤以「徵糧為第一要務」。²³

台灣的賦稅制度始自荷蘭時期（1624 - 1662）。連橫《台灣通史·田賦志》有記：

天啟四年，荷蘭人入台灣，借地土番。越二年，西班牙人亦入雞籠，各據其地，以殖土宜，制王田，募民耕之，而徵其賦。²⁴

當時所課賦稅，以田賦為大宗，明鄭時期（1662 - 1683）大抵承襲荷人舊

22 季麒光，〈密陳營盤累民文〉，引自《政事集》，頁202。

23 季麒光，〈覆詳地粟定額文〉，引自《政事集》，頁207。

24 見連橫，《台灣通史·田賦志》（台北市：眾文圖書，1979），頁168。

制，然而兩者的目的不同。蓋荷人所徵，旨在輸往海外進行貿易；明鄭以台灣為抗清基地，所徵意在「足兵足食」。一在圖利；一在取食。蓋鄭氏能以台灣一隅海島之地，對抗全盛之滿清，達二十餘年者，固憑藉其鮮明正確的政治號召，實亦得力於其財經措施之有效支援。²⁵而此「財經措施之有效支援」，自然包括田賦所徵。入清後，中央原欲按照明鄭時期之稅率「照舊」徵取，但季麒光身在地方，瞭解台灣「人散地荒」情形的嚴重，故為文建議在各項賦稅上「分別有徵無徵、應蠲應減」。²⁶因此，清廷為體恤台灣經歷「湯火之餘」，故在田賦方面酌予減低，「以蘇民困」。儘管如此，較諸同時期內地蘇、松等府「極腴之田、極重之徵」²⁷而言，台灣所徵田賦仍然過高。茲將台灣田賦稅率和內地蘇州和松江等府田賦稅率整理成表，以供比較。

台灣和蘇、松等府田賦稅率一覽表：²⁸

田 則 時 期	上則田 一甲稅率	中則田 一甲稅率	下則田 一甲稅率	備 註
荷蘭時期	18石	15、6石	10、2石	
明鄭時期	18石	15、6石	10、2石	
清領初期	8、8石	7、4石	5、5石	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六年

25 參考自鄭喜夫，〈明鄭晚期台灣之租稅〉，引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台灣經濟史十一集》（台北市：台灣銀行，1974），頁97。

26 季麒光，〈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引自《政事集》，分見頁158、165。

27 季麒光，〈申覆丈量文〉，引自《政事集》，頁209。

28 本表所載各時期田賦稅率資料，前三欄參考自連橫，《台灣通史·田賦志》，頁188 - 191；末欄則參考自季麒光，〈再陳台灣事宜文〉，引自《政事集》，頁180 - 181。

清領初期	1、5石至2石	從缺	從缺	蘇州和松江等府
------	---------	----	----	---------

從上表所列可知，以清領初期上則田的稅率為例，內地蘇州和松江等府每甲地所徵，約在一石五斗至二石之間；而台灣每甲地所徵，卻高達八石八斗。附表資料雖然缺少蘇州和松江等地中、下則田的相關稅率數據，然而從上則田的稅率比例可以推知，內台兩地的田賦稅率相差超過四倍。進一步細究內台兩地田賦的差異，台灣此時方脫離鄭清交鋒狀態未久，大批人力被遷回內地，民力和物力等各方面仍待復甦，即使是每甲地課以上表中的稅率，對台灣當時的生產力而言，仍嫌過苛。台灣田賦沈重若此，使季麒光不禁要為諸羅縣百姓發出「民力幾何，堪此重徵乎」²⁹的哀告。彼時清朝統治尚短，加上「雨暘時若」，³⁰所以民力尚可支持。因此，季麒光向上級提出警語，認為「倘卒遇凶荒，莫可補救。所謂不患於瓦解而患於土崩者，正今日之情形也。」³¹其見可謂洞燭機先，防患於未然。

2、丁銀

台灣賦稅過重的情形，不僅出現在田賦，尚有「丁銀」一項。丁銀即人頭稅，依成年男子人口數量課稅，故曰「丁銀」。丁銀的課徵，始於漢代，其範圍從十五歲以上至五十六歲以下，³²後世則改以十六至六十歲為課徵對象。季文〈再陳台灣事宜文〉中提到：

人丁之稅，莫重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謂其地曠土疎，故取足於丁也。然稻麥黍粟生之，梨棗柿栗生之，棉麻萱竹生之，一頃百畝止納銀三、四兩，輕於彼而重於此，猶可言也。大江左右，田稅既重，丁稅不過一錢，且或一家數口而報一丁，或按田二、三十畝而

29 季麒光，〈再陳台灣事宜文〉，引自《政事集》，頁181。

30 季麒光，〈再陳台灣事宜文〉，引自《政事集》，頁181。

31 季麒光，〈再陳台灣事宜文〉，引自《政事集》，頁181。

32 參考自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賦役志》，頁160。

起一丁，未有計口而盡稅之如台灣者，未有每丁重至四錢八分如台灣者也。今既多其粟額，而又重其丁銀，較之偽鄭則已減，較之內地則實難。³³

季麒光來自內地，又曾仕宦於內地，故對內地的賦稅了然於心。他指出華北「山之東西、河之南北」等地，因為「地曠土疎」，故輕田賦而重丁銀。而華中「大江左右」一帶，田賦雖重，丁銀則相對減輕許多，「丁稅不過一錢」，甚至有以耕作面積來換算丁數的情形。顯然內地在課徵田賦和丁銀等兩項稅賦的設計上，能夠因地制宜，採取「輕於彼而重於此」的策略，故雖二稅兼有，卻不致於對人民造成過重的負擔。但台地卻田賦和丁銀兩者並重，中央雖然將丁銀稅率酌減至四錢八分，惟仍有「較之偽鄭則已減，較之內地則實難」之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未獲見《東寧政事集》之前，方志咸謂明鄭時期台灣的丁銀為「六錢」，如《諸羅縣志》云：「前此鄭氏不分主客，計口算丁，每一丁年徵銀六錢。」³⁴在《台灣通史·戶役志》亦云：「及荷蘭來，賦課丁稅，每丁四盾。……鄭氏因之，每丁改為六錢，熟番如之。」³⁵然而，季文〈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在「人丁」項下具言：

查偽例，佃丁鋪戶每丁徵銀三錢八分；難民每丁徵銀六錢八分；閒散民丁每丁徵銀九錢八分。³⁶

於此可知，明鄭時期對丁銀的課徵，係按照百姓的身份而分成三種不同的稅率。第一種即佃農和商人，斯輩因為還要負擔其他稅種，因此僅課以最低的三錢八分；次為一般百姓，課以六錢八分；對於「閒散民丁」的無業遊民，則課以較高額度的九錢八分，似有「寓懲於征」的意義在內。明鄭時期丁銀

33 季麒光，〈再陳台灣事宜文〉，引自《政事集》，頁181。

34 見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賦役志》，頁162。

35 見連橫，《台灣通史·戶役志》，頁151。

36 季麒光，〈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引自《政事集》，頁161。

的三種稅率皆非六錢，方志所載顯然不符實情。據此可知，明鄭和清領時期對台灣丁銀的徵收方式，最大的差別在於明鄭時期依照丁口身份採取三種稅率，而清代則一視同仁，始終採取單一稅率。

3、其他雜稅

明鄭早期，對台地所課以田賦和丁稅為財政上的主要收入來源，以陳永華籌畫經營有方，故「民高財足，國用不匱」；及至明鄭晚期，鄭經西征大陸失敗，加上陳永華物故，因此「政教漸弛，而雜稅濫徵矣。」³⁷

由於鄭軍長期投入反清復明的事業，不僅軍費浩繁，更因長期抽丁作戰，造成台灣內部生產力不足，復以清廷為打擊明鄭的經濟，在大陸沿海地區頒佈「禁海」令。而陳永華去世後，東寧治國失人，財政日益惡化，遂在田賦和丁銀等正供之外，額外加徵許多稅目。鄭氏所徵雜稅，項目繁多，根據季文〈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所載，略述其要如下：

- (1) 社港：包括番社賻稅和港口稅兩項。
- (2) 鹽埕：以鹽田面積課稅。
- (3) 罟繒罽縴泊緞蠟等項：各式大小捕魚所用之器具，亦須課稅。
- (4) 牛磨：以牛隻磨粉為課稅目標。
- (5) 蔗車：以製糖之車為課稅目標。
- (6) 載鹽出港：出港鹽稅。
- (7) 澎湖人丁園地船網等項：澎湖丁銀、田賦、船隻和捕魚器具等稅。
- (8) 僧道：課僧道度牒（許可證）之稅金。
- (9) 載貨入港：入港貨物稅。
- (10) 街市店厝：房屋稅。
- (11) 鎮省渡船：以安平附近河川之渡船稅為主。

上述各項，除（7）澎湖人丁園地船網等項之外，餘者皆與諸羅縣有

37 參考自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財政篇〉（台北市：成文，1983），頁33。

關。清領以後，「不察時勢之難易」，根據「偽鄭之冊」所列，「照舊」按額徵取。在明鄭時期所留下的諸多雜稅之中，以水餉雜稅最受人詬病。季麒光便直言：「至港既有稅矣，又開啟罟繒罾網之徵、梁頭之徵、烏魚給旗之徵，是一採捕而分數徵也。」³⁸此外，高拱乾《台灣府志·賦役志》亦云：「台、鳳、諸三縣，罾、繒、罟、網有稅，漁船、樑頭有稅，二十一港又有港稅，均循舊例重複徵輸，亦有不可不為酌減去留者。」³⁹而《諸羅縣志·賦役志》亦言：

水餉、雜稅之徵，多屬鄭氏竊踞時苛政；而最重者，莫如船港諸稅。夫船出入於港，而罟、繒、罾、網、梁、頭、烏、魚、給、旗，則取魚蝦、牡蠣於港者也。乃既稅其船，又稅其罟、繒、罾、網、梁、頭、烏、魚、給、旗，且稅其港，蓋一港而三其稅焉。嗟此蟹舍蚩蚩，有不望洋而興歎、相戒而裹足者哉？⁴⁰

事實上，當時台地經過明鄭晚期的諸多苛徵，已呈「民貧俗弊」⁴¹的現象。改朝換代後，鄭氏官兵和許多漢人被遷回內地，以致於人口減少，生產力和經濟力也相對下降許多，加上海禁不再，⁴²船隻轉往內地吞吐，入港數量減，因此許多稅目已無法如數繳齊。職是之故，季麒光上陳曰：

民多，則稅多；民少，則稅少。若不問民數之去留，時勢之難易，而欲據偽冊開報之數，取償于萬不可得之時，雖智者無所施，勇者無所用也。⁴³

清領之初，因為人口銳減和政策改變，致使各項賦稅目標難以達成，季麒光

38 季麒光，〈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引自《政事集》，頁162。

39 見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台灣府志·賦役志》之「總論」（台北市：行政院文建會，2004），頁288。

40 見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賦役志》之「雜稅」，頁182。

41 季麒光，〈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引自《政事集》，頁159。

42 季麒光在〈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載貨入港」一項指出：「查當時（按：明鄭）內地海禁森嚴，外番洋船多入台灣，故有是額。今富商大賈盡歸內地，且奉旨開洋，外番船隻概向閩、粵大澳，台灣港口紆迴，並無船隻入港。此項額銀，實無可徵，合請豁除。」引自《政事集》，頁164。

43 季麒光，〈請免二十三年半徵文〉，引自《政事集》，頁155。

不禁要發出「無米為炊」之感嘆。

（二）權貴占田

季麒光提到治台有三大患，其三為「蔭占之未清也」。⁴⁴他到諸羅縣時，百廢待舉，僅釐清賦稅一項即困難重重，尤以賦稅短收的情形為最，使他不得已一再上書申明箇中原因，並祈請蠲減各項賦稅。造成賦稅短收的原因，除了因人口流失而導致商業行為減少以及農業生產力下降之外，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季文所云「蔭占未清」，也就是權貴占田。當時台灣最大的權貴者為靖海侯施琅。

施琅因平定台灣而立下奇功，康熙皇帝大喜，「解御袍賜之，封靖海侯，世襲罔替」，⁴⁵一時榮寵無比。除加官晉爵外，清廷還將南台灣大批土地賜給他，作為「勳業地」。施琅所得的土地很多，它幾乎占去南台灣已開發土地之大半，使他成為當時台灣最大的地主，並由此征收大租，名曰「施侯租田園」。其地除台南城內樣仔林施公祠地外，還有漚汪堡（包括將軍庄、巷口庄）、學甲堡（包括中洲庄、溪底寮庄、北門嶼庄、蚵寮庄、學甲庄）、打貓西堡（包括舊南港庄、埤頭庄）、牛稠溪堡（包括番婆庄、菜公厝庄、月眉潭庄、潭仔墘庄、中洋仔庄、三間厝庄、大客庄、大崙庄、溪北庄）、觀音中里（包括大社庄、保舍甲庄、楠梓坑庄、土庫庄、林仔邊庄、三奶壇庄）、半屏里（包括後勁庄、八卦寮庄、右沖庄、大灣庄）、大竹里（包括籬仔內庄）、興隆內里（包括覆鼎金庄）、興隆外里（包括左營庄）、小竹上里（包括翁公圓庄、山仔頂庄）、仁壽上里（包括潔底庄、港口崙庄、白米庄、梓官庄、大舍甲庄、蚵仔寮庄、茄苳坑庄、街尾崙庄、後協庄、塩塹庄、彌陀港庄、海尾庄、舊港口庄、石螺潭庄、阿公店街、前鋒庄、赤崁庄）、仁壽下里（包括下塩田庄）、觀音下里（包括灣仔內庄、赤

44 季麒光，〈再陳台灣事宜文〉，引自《政事集》，頁182。

45 見連橫，《台灣通史·施琅列傳》，頁770。

山仔庄、仁武里庄、竹仔門庄、新庄）。為管理這些田租，施琅在台灣設立十處「施公租館」，置管事分掌收租事宜。這些管事再把所收租金交由縣、府、省代行送繳北京施家。至道光年間，這些租館僅剩四處；又至日治時期（1895 - 1945），以施家非「日本國民」而被沒入官方。⁴⁶施琅在台地的田租，經由地方官吏層層遞送至京，可知當時施琅在台灣享有極大的特權。此外，跟隨施琅平台的僚屬也多獲得這類勳業地⁴⁷。關於這類勳業地的經營狀況、田租比率及征收方式等細節問題，因為資料短缺，目前無從得知。施偉青認為施琅及其僚屬因獲得這些勳業地，而成為開發台灣的「有力者」。⁴⁸其說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大多數的勳業地已經在明鄭時期開發完成，且施琅及其僚屬並非為了「開發」，其目的只在「私利」。日人伊能嘉矩便指出：

對於台灣之棄留猶疑莫決，施琅雖一力主留，觀其種種作為，更是私心重於公益。易言之，施琅乍見土地肥沃，物產豐盛，油然有攫為己有之心，惟不敢步武鄭氏後塵，故利用軍權霸占田地。⁴⁹

季文〈再陳台灣事宜文〉云：

乃將軍（按：施琅）以下，復取偽文武遺業，或托招佃之名，或借墾荒之號，另設管事，照舊收租。……且田為有主之田，丁即為有主之丁，不具結，不受比，不辦公務，名曰「蔭田」。……夫蔭丁，有形之患也。……占田，無形之患也。⁵⁰

季文所云「蔭田」，就是施琅及其僚屬的勳業地。熱中功利的施琅並不滿足於朝廷所賜的蔭田，還趁機佔有大批明鄭時期文武官員既墾之地，當時名曰「文武官田」。⁵¹此等土地俱為良田，年產量均較一般土地為佳，這便

46 「施侯租田圖」參考自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編，《南瀛文獻》第二卷第一、二期合訂本（台北市：成文，1983），頁43。

47 見史明，《台灣四百年史》（台北市：自由時代，1980），頁159。

48 見施偉青，《施琅評傳》（廈門市：廈門大學，1987），頁264。

49 見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中譯本）上卷（台中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頁517。

50 季麒光，〈再陳台灣事宜文〉，引自《政事集》，頁182。

51 季麒光，〈覆陳二十四年餉稅文〉，引自《政事集》，頁158。

是季文所云的「占田」。因為施琅權大位尊，這些占田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蔭田」，一併列入「施侯租田園」的管理。施侯租的土地直至二百年後的日治時期（1895 - 1945），還剩下三千甲之多，⁵²可以想見當二百年前施琅的全盛時期，田地面積應該數倍於此，據施添福估計當在萬甲之數。⁵³如此大面積的田園，自然需要大量人力耕種以及管理，這些還不包括施琅的僚屬們侵佔的土地及所需的人力。施琅因功勳及強占得到大批土地並藉此收租，上行下效之餘，其僚屬也各置田地飽其私囊，並大肆招攬來自內地的游民（含偷渡者）進行墾耕，為台灣吏治及社會治安帶來極為不良的影響。

季文〈蔭丁漏糧文〉又云：

督墾收租，不受節制于縣官，所轄佃丁不辦公務，名曰「蔭佃」。……夫田糧丁賦皆縣官職掌，今身居民上，而法不行于管事，令不及于佃丁，上悞國課，下累貧民。⁵⁴

施琅及其僚屬所擁有的大量佃丁為「有主之丁」，因為「有力者」的保護，得以不受地方官員的管轄，因此「不具結，不受比，不辦公務」，成為地方行政權下的「化外之民」。蔭田佃丁既享有特權，一則得以因此「逃漏稅」；再則地方公差人力必得由「貧苦之丁，無主可投者，獨當差遣」，⁵⁵則蔭田佃丁之豁免便在無形中加重一般百姓的負擔。影響所及，「化外之民」的人數便不斷增加。如此一來，地方官員既無法從蔭田課得田賦，又不能從佃丁身上課得丁錢及徵召公差，在錢糧丁稅和地方勞役兩方面，便出現賦稅缺口和人力失衡的情形，這對原本已經是「人去業荒」的諸羅縣而言，不啻是雪上加霜之舉。在此情形下，朝廷又按照明鄭時期的資料課徵，自然

52 參考自惠邨，〈清代台灣之租賦〉，引自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文獻》第十卷第二期（台北市：成文，1983），頁91 - 147。

53 參考自施添福，《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1987），頁61。

54 季麒光，〈蔭丁漏糧文〉，引自《政事集》，頁205。

55 季麒光，〈蔭丁漏糧文〉，引自《政事集》，頁205。

是「萬難及額」。季文所云蔭田和占田糾纏不清（蔭占未清），其弊在此。

此外，從權貴占田所衍生出來的社會治安問題，則是蔭田管事倚仗特權、橫行不法的情事。季文〈蔭丁漏糧文〉接著論及蔭田管事素質良莠不齊，往往「借招墾為名，鳩集匪類」，如胡國材、何紀等叛亂份子，最初皆為蔭田管事，後來竟「共謀不軌」，他擔心「若輩肆無顧忌」，「恐將來變生不測」，屆時責任將誰屬？蔭田管家倚勢欺人、目無法紀的劣跡，並非僅止於上述二者。新化里鄉人皆稱施琅手下管事葉虔「將民田冒指營盤（按：軍營土地），橫徵租粟，不論上中下則，每甲收一十八石」，當地百姓不堪其惡，「紛紛具控」。⁵⁶清代台灣田賦稅率已從上表得知，但葉虔不分田等，每甲一律強取一十八石，比上則田官租尚多出二倍有餘，其橫征暴斂的程度，令人咋舌；而台灣水師副總兵林葵的管家曾才之惡行又是另一例證。⁵⁷總之，蔭佃管事瞞上欺下、魚肉鄉里的不法行為，已經嚴重影響到民生與治安。於是，季麒光提出「令各田主管租不管丁」之法，希望藉此解決地方行政上的漏洞。「管租不管丁」，在使權貴只能享有田租而不及於佃丁的人事管理權，其真正用意在阻止權貴勢力過度干擾地方行政，以真正落實地方官吏的治權。所謂「蔭占未清」之患的真諦亦在於此。

為此，季麒光怕因而獲罪於施琅及其僚屬，故在〈蔭丁漏糧文〉之後，還煞費苦心地寫有〈附上將軍施侯書〉一文，委婉地向施琅陳訴「從來履滿席豐者，或以貪黷而敗，或以跋扈而敗，或以結納而敗，或以狗馬聲色驕淫而敗，或以門賓幕吏招搖而敗」的道理，希望「君侯俯加垂察，使職得效馮謹之誠，為君侯廣焚券之仁。」⁵⁸

從季文〈再陳台灣事宜文〉、〈蔭丁漏糧文〉、〈密陳營盤累民文〉

56 季麒光，〈密陳營盤累民文〉，引自《政事集》，頁202。

57 曾才擔任林副將蔭田管家時，因侵欠倉粟及誘拐人妻，兩罪併發後，遂遁入兵籍，企圖脫罪。其事分見於季麒光，〈牒水師林副將文〉和〈倚營拐逃審語〉二文，引自《政事集》，頁219 - 220、232。

58 季麒光，〈附上將軍施侯書〉，引自《政事集》，頁203 - 205。

到〈附上將軍施侯書〉等數篇，可見季麒光為民請命的用心良苦，以及處理權貴占田事務時的戰兢謹慎，其官箴足式。諷刺的是，在此之前，施琅曾上書康熙皇帝為台民請求減免明鄭時期所留下的各項「重科」，以使「四民樂業，億兆歡戴」。⁵⁹然而，施氏及其僚屬占田之舉所帶來的後遺症，正是當時台地的一大秕政。而康熙皇帝對施琅在台的特權行徑，應該是默許和縱容的。否則，絕對不會讓施琅專任福建水師提督長達十五年之久（康熙二十年至三十五年），至死為止。

四、《東寧政事集》呈現的社會風氣問題

清領之初，台灣尚屬移墾社會型態，季麒光在大力招攬內地人民前來拓殖斯土的同時，為杜絕社會不良風氣之先，一連發出數道告示諭民，包括〈嚴禁結拜示〉、〈禁賭博示〉和〈諭盜賊示〉等公告。

（一）禁結拜

結拜之風，古已有之，特別是在《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小說問世後，對下層社會的影響甚鉅。「桃園結義」及「梁山聚義」在性質上都是一種異姓兄弟的金蘭結義，可以說異姓結拜風氣的盛行，主要是受到這兩部小說推波助瀾的結果。於是，社會下層人士紛紛模擬家庭宗族的血緣關係，彼此以兄弟相稱，藉盟誓來約束成員，強調義氣千秋，以維持橫向的平行關係，並發揚四海皆兄弟的精神，企圖藉此在混亂的年代或社會裡，能團結一致，互相支援，使彼此都能獲得相對的安全感。而這種「結義」精神，在草萊初闢的台灣社會尤為盛行。

結拜風氣盛行於早期的台灣社會，其來有自。蓋明末清初以來，由於

59 見施琅，〈壤地初闢疏〉，引自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撰，《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貳輯第九冊，頁50。本文上奏時間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九日，季麒光於該年十一月初八日到台灣。

閩粵內地，地狹人稠，生計維艱，閩粵先民遂紛紛渡台，披荊斬棘，墾殖荒陬，使台灣逐漸形成一個移墾社會。先民來台拓墾後，以祖籍居地的關係形成聚落，各分畛域，彼此之間為了土地、水利及其他利益因素，動輒互相凌壓，呈現尖銳的社會對立現象。當時因社會組織不夠健全，公權力薄弱，治安欠佳，自力救濟就成為普遍的社會調適方式。於是，結盟拜會和分類械鬥就成為台灣早期移墾社會中常見的自力救濟行為。⁶⁰此舉對社會治安造成相當程度的激盪和困擾，甚至可能危及治權，自然無法見容於當局，故多明令禁止。當時來台拓墾者，多為內地無業之流民，其中又以單身男子居多，在充滿未知數的惡劣環境之下，彼等為尋求更高的安全感，自然「尚結盟」之風。對此，《諸羅縣志·風俗志》有記：

尚結盟，不拘年齒，推有能力者為「大哥」；一年少者殿後，曰「尾弟」。歃血而盟，相稱以行次。家之婦女亦伯叔稱之，出入不相避；多凶終隙末及閨閣蒙垢者。近設禁甚嚴，其風稍戢。⁶¹

季麒光對社會上的結拜風氣，亦持反對的看法，因此具文禁止百姓結盟拜會。在〈嚴禁結拜示〉文中，他指出結拜的成員多半是「市井游手游食之人」，容易「因盟起禍，敗身家而辱名節」，並歸納出四種害處，分別為「奸之媒」、「貧之基」、「盜之門」和「爭之階」，今僅舉其二略述，以概其餘。在「奸之媒」項云：

甲與乙既為兄弟，……甲之妻為大嫂，乙之妻為弟媳矣，……而市佃民居，又無層樓疊室以為內外之防，勢必穿房入戶如真骨肉。為日既久，恐目交眉語，肩接手招，瓜李之嫌不復顧忌。誰如秉燭之天神，誰是坐懷之男子？……爭殺妒殺皆從此起。⁶²

60 見莊吉發，〈自力救濟——新竹義民與林爽文之役〉，引自《清史講義》（台北市：實學社，2002），頁209。

61 見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風俗志》之「雜俗」，頁229。

62 季麒光，〈嚴禁結拜示〉，引自《政事集》，頁224。

異姓之人結為金蘭後，勢必「如真骨肉」般「出入不相避」彼此的女性親屬，時日既久，姦情暗萌，使「閨閣蒙垢」，若此必致殺機，故曰「盟者，奸之媒也」。

其「爭之階」項云：

人心之不同，猶如面焉，雖稱兄弟，豈能竟忘爾我？或杯酒相爭，或銀錢相競，橫拳惡口，禍起頃刻。故朝為盟契，夕為仇，往往有之。且兄弟既眾，則聲援必廣，……而交拳鬪手之時，……眾人助之，甚至辱人于市，斃人于野。⁶³

同胞手足猶有「蕭牆之禍」，況且異姓之間人心不同，動輒為杯酒細故或金錢利益而朝夕反目。兼以「兄弟既眾」，群起助拳，尋釁復仇，有恃無恐，輕則「辱人于市」，重則「斃人于野」，以致於自蹈刑戮而無已。

從方志所載以及季文所示，可見當日台灣移民結拜風氣之盛。然而，如前文所述，結盟拜會風氣的形成，有其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當局之所以嚴禁民間結拜之風，不僅止於杜絕社會歪風，更深層的原因是在防止有心人士假結拜之名而結成會黨，遂行不法叛亂之實。觀有清一代，台灣三大民變中的林爽文和戴潮春兩案，即是藉結盟拜會進而壯大作亂之例。⁶⁴

（二）禁賭博

除了禁止人民結拜之外，季麒光亦明令禁止賭博惡習。其〈禁賭博示〉提到賭博為「爭之門而盜之階」，並認為從事賭博以及旁觀賭博者都是「少年無賴之徒」。他還進一步詳陳賭博者沈淪為盜賊的過程，其云：

一輸思復，至于再；再輸不甘，至于三。失事悞時，衣食田疇皆不暇顧。在家庭則為敗子，在鄉黨則為匪民。至於輸負既多，急欲思

63 季麒光，〈嚴禁結拜示〉，引自《政事集》，頁225。

64 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藉天地會起事；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藉八卦會起事。分見連橫，《台灣通史》之〈列傳三·林爽文列傳〉、〈列傳五·戴潮春列傳〉，頁819-827、883-894。

逞，……勢必出於偷盜。始則拈針拾芥，繼則穿壁踰牆。⁶⁵

同時在〈諭盜賊示〉也提到「無論少長，皆以賭博為雄，誠恐因賭而貧，因貧而盜。」⁶⁶因賭而貧，因貧而盜，不僅喪身敗家，連累妻小，甚至為盜為匪，危害鄉里。故季麒光為文諭民，禁止此一惡習滋長，嚴令「無論軍民、無論鄉市，如敢羣聚賭博，許地方指稟，立拘枷示。」然而，台人好賭成習，絕非季麒光一紙文告所可禁止。及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方志猶記曰：

喜博，士農工商卒伍相競一擲，負者束手，勝者亦無贏囊，率入放賭之家；乃有俊少子弟、白面書生，典衣賣履，辱身賤行，流落而不敢歸者。此風漳、泉多有，台郡特盛。拔本塞源，惟在嚴治誘賭之無賴、放賭之窩家；而為父兄者，教尤不可不先也。⁶⁷

康熙六十一年（1722），來此視察的首任漢籍巡台御史黃叔璥⁶⁸便將台人徹夜聚賭的情形以及賭博的種類，錄在《台海使槎錄·赤嵌筆談》的「習俗」一項，⁶⁹顯見當時台地賭風之盛。同書亦收錄《諸羅雜識》對此惡俗的相關記載：

台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賭博，惡業也；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挾資登場，叫號爭鬨，始則出於典鬻，繼則流於偷竊，實長奸之囹也。⁷⁰

從季麒光文告到黃叔璥所見，可知台人好賭，蔚然成風，而社會風氣也始終

65 季麒光，〈禁賭博示〉，引自《政事集》，頁226。

66 季麒光，〈諭盜賊示〉，引自《政事集》，頁228。

67 見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風俗志》之「雜俗」，頁229。

68 黃叔璥，字玉圃，號篤齋，直隸大興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任「巡視台灣監察御史」（簡稱巡台御史），雍正元年（1723）留任一年。清例，巡台御史一職，滿漢各一，一年一任，與其同時到任的滿員為吳達禮（隸滿洲正紅旗）。見鄭喜夫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八職官志》第一冊（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2。

69 據黃叔璥所記：「士夫健卒喜賭博，永夜謹呶呼盧之外，或壓銅錢射寶字以賭勝，名曰壓寶。又為紙牌三十六頁，分文、武、院、科四項；文尊閣老，武尊國公，院尊學士，科尊狀元；每項九等納粟，列庶吉士之上。」引自黃叔璥，《台海使槎錄·赤嵌筆談》之「習俗」項，頁43。

70 見黃叔璥，《台海使槎錄·赤嵌筆談》之「習俗」項，頁38-39。

因此無法獲得提升。

（三）軍紀不佳

季文〈再陳台灣事宜文〉指出台灣有三大患，其二為「民兵之難辨」，文云：

台灣之兵多係漳、泉之人，……但此輩之來，既無田產，復無生計，不托身于營盤，而潛踪于艸地。似民非民，似兵非兵，里保無從問，坊甲無從查，聚飲聚賭，穿壁踰牆。無賴子弟，倚藉引援，……始而為賊，繼而為盜。⁷¹

清廷為防台，在台駐軍施行「班兵制度」。⁷²蓋內地駐軍「兵皆土著」，以本地人為兵，作用在易於管束。因為土著之兵，其家室就在軍營所在地，倘使在本地犯法，家人就得受到連累。⁷³反之，台地官兵皆為外地進駐的綠營兵。內地綠營抵台後，卻軍紀日下，「聚飲聚賭，穿壁踰牆」，甚至與本地無賴人等結合，以致於「官兵變強盜」。何以如此？肇因於綠營薪餉偏低。

清順治五年（1648）以後，規定綠營馬兵月給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各兵丁另外月給米三斗，「此後遂成定制，不復更改」。⁷⁴同一數額的糧餉，在順治初年或許尚可支應生活所需，但是到了康熙中葉，積年累月，物價日漲，自然已經無法應付士兵養家活口所需。因為餉薄，「綠營兵丁便不得不另尋副業，或做小販、或做手藝，以為生活的幫補。」⁷⁵士兵兼差以謀生計，是造成部隊戰力與軍紀日益廢弛的主因。蓋兵丁既在外兼營副業，自然無法按時操練，又散居在坊間與民人混雜，「似民非民，似兵非兵」，有事時不能立即召集起來，禁令便有所不能及，訓練便

71 季麒光，〈再陳台灣事宜文〉，引自《政事集》，頁181。

72 施琅在〈恭陳台灣棄留疏〉建議清廷：「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裁汰，以之分防台灣、澎湖兩處，……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見施琅，《靖海紀事》（台北市：台灣銀行研究室，1958），頁61。

73 參考自余光弘，《清代的班兵與移民：澎湖的個案研究》（台北縣：稻香，1998），頁46。

74 參考自羅爾綱，《綠營兵志》（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頁344。

75 見羅爾綱，《綠營兵志》，頁347。

有所不能施，兵丁的心志和精力因此而日漸鬆懈，軍紀和戰力遂江河日下。駐台官兵軍紀不佳的程度，有時甚至連漳、泉籍的兵丁還加入民間漳、泉械鬥的紛爭之中。⁷⁶朝廷為了規範駐台官兵的軍紀，兵部還特地在〈台灣兵丁滋事〉文中，明令「將台營約束不嚴之該管官革職公罪」，甚至還連坐其他相關官員。⁷⁷惟似乎因為「天高皇帝遠」，再加上有司的包庇與維護，並未收到顯著的效果。

駐台官兵的薪水既已偏低，加上「往返台澎的駐地又需要增加大筆的開支」，⁷⁸於是兵丁只好賺錢補貼生計，或「做些賣放人口偷渡等違法失職的勾當，來取得經濟上的補充。」⁷⁹此時若該管官員和兵丁「沆瀣一氣」，共同收取不法所得之利益，如偷渡的規費，自然就必須加意維護屬下兵丁。

內地因為「兵皆土著」，軍紀尚知自制。綠營到了台地後，家眷不在本地，「既無田產，復無生計」，三年期滿便可「班師回朝」，又得不肖上司包庇和縱容，遂更無所忌憚。季文〈清查兵伍文〉便指責台地兵丁的惡行，「出入鄉里，無事則藉兵之名，有事則非兵之實，黨眾勢橫，莫敢如何。」⁸⁰接著又指出主管官員的維護，「雖無縱兵之事，而衛之，實陰以縱之。」⁸¹台地軍紀墮壞成風，可想而知。

為了安靖地方，季麒光建議上司清查軍籍並發給識別證，以辨別軍民，企圖藉此遏止「民兵難辨」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其云：

切欲靖盜，必先清兵；然總鎮必不肯清，文官又不能清。惟請憲台印給腰牌之布，使各兵縫以為識，……則兵民可辨，盜賊可息矣。⁸²

76 參考自許雪姬，《清代台灣的綠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268。

77 見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撰，《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貳輯第九冊，頁60。

78 見余光弘，《清代的班兵與移民：澎湖的個案研究》，頁64。

79 見許雪姬，《清代台灣的綠營》，頁372。

80 季麒光，〈清查兵伍文〉，引自《政事集》，頁200。

81 季麒光，〈清查兵伍文〉，引自《政事集》，頁200。

82 季麒光，〈清查兵伍文〉，引自《政事集》，頁201。

季氏建言的效果為何，從現存資料中無法得知。但清廷駐軍台灣，本在安定地方，不意卻因制度和人為的疏失，成為社會治安亂源之一，允為當時可怪的現象。究其原因，乃在駐軍管理階層的「人謀不臧」。

五、《東寧政事集》呈現的番政問題

台灣原住民分成平埔族和高山族，漢人移墾台灣後，原漢之間衝突不斷。因此，台灣歷代統治者莫不將「理番」視為治台要務之一。連橫有云：台灣固土番之地，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長育子姓，至於今是賴。故自開闢以來，官司之所經畫，人民之所籌謀，莫不以理番為務。……夫台灣之番，非可羈縻而已也；得其地可以耕，得其人可以用，……是故理番之事，台灣之大政也，成敗之機，實繫全局。⁸³

由於諸羅縣「所轄俱係番社」，⁸⁴因此直至清領之初，諸羅縣的人口結構仍是「番多於民」的局面。原住民不僅要向統治者納稅，同時必須負擔各項勞役和公差，是當時社會負擔最為沈重的族群。季麒光在台時間雖然不長，但他留意到原漢之間的種種問題。在〈詳議勦捕土番文〉、〈詳陳賸社之難文〉、〈請禁撥用土番文〉、〈請禁夫車文〉和〈安諭民番示〉等文，皆可見到他對理番事務的看法以及處理方式。必須先說明的是，在季麒光筆下的「番」、「番民」或「土番」，所指皆為熟番，也就是今日的平埔族，因為清領之初的治權尚不及於高山族，自然無關於「番政」問題。為清楚起見，下文所述之「原住民」，皆指平埔族。以下分別從「社商和通事的朘削」、「差役沈重」和「原漢衝突」等三項加以討論。

83 見連橫，《台灣通史·撫墾志》，頁415。

84 季麒光，〈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引自《政事集》，頁165。

（一）社商和通事的剝削

季文〈詳陳賸社之難文〉指出原住民長期受到賸商嚴重的剝削，以致於「幾十年來，番民之力已重困矣。」⁸⁵賸商制度源自於荷蘭時期的社商制度，創設於西元一六四五年（清順治二年），是早期台灣一項極為特殊的交易和徵稅制度，最初是一種定期定場的交易制度。⁸⁶因為荷人對台灣的經營重點在於經濟上的掠奪，不在政治上的經營，為節省行政經營，便轉成賸商制度（賸港相仿）。因此，執政當局對社餉（或港餉）交由以最高代價承應的商人（即賸商、社商）承包，再由賸商按照先前所認辦的金額交稅，而給予賸商所承賸之社、港享有獨佔該社漁獵產品及農產品之專買與其他生活必需品專賣之權，這種制度有類於現代「包稅商」的代理人制度，故賸稅在形式上是由賸商繳交與政府。此法既可省去經營番社的繁瑣事務，又得以保障收到固定的稅額，頗符合掠奪經濟的效益。這套制度雖始自荷人，但明鄭和清朝亦沿用之。黃叔璥對這種制度有相關的記載：

賸社之稅，在紅夷即有之。其法每年五月初二日，主計諸官集於公所；願賸眾商，亦至其地。將各社港餉銀之數，高呼於上，商人願認則報名承應；不應者減其數而再呼，至有人承應而止。……商人既認之後，率其夥伴至社貿易。凡番之所有，與番之所需，皆出於商人之手；外此無敢買，亦無敢賣。⁸⁷

此外，鄭其照亦提到：

每歲賸社之人，用小舟載有烟、鹽、糖、鍋釜、農具往與貿易，番

85 季麒光，〈詳陳賸社之難文〉，引自《政事集》，頁169。

86 先住民（按：原住民）在農耕上的剩餘農產品及狩獵所獲，受荷蘭人的命令，在每年的五月二日，在一定的場所與荷蘭人進行交易。此時先住民並不接受荷蘭人的貨幣，而只是選取其必要的日用品。這交易稱為「社商」。參考自奧田或、陳茂詩、三浦敦史等合著，〈荷領時代台灣農業〉，引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銀行季刊》第6卷第1期（台北市：台灣銀行，1954），頁188。

87 見黃叔璥，《台海使槎錄·番俗雜記》（台北市：台灣銀行，1957），頁164。

以鹿脯筋皮市。皆以物交相易，不用銀錢。一年止一往返。⁸⁸

由於贖商制度的執行，必須仰賴包稅商人的「報名承應」，才能執行這項稅務，而這些包稅商也因為有利可圖，才會認贖番社。因此，商人往往提高商物所值，而壓抑番物所值，以從中賺取更多的利潤。季麒光掌諸羅縣後，便在〈詳陳贖社之難文〉直陳商人剝削原住民的情形，其云：

番民之所耕所畜與所取于海山之利皆歸於贖商之手。……奸商意為低昂，大約商物一倍，取其五倍；番物五倍，給其一倍。⁸⁹

不肖商人不僅對原住民進行剝削，還趁新任地方官員對贖商事務尚不熟稔之際，藉故「多所推阻」且「奸刁百出，故意把持」，⁹⁰企圖從中獲得更多利益。因此，季麒光便對為首不肖商人黃玉及其眾嚴詞加以訓斥道：

本縣初蒞茲土，既禁額外之徵，復缺額內之課，爾社商竟不相諒，終日嘵嘵，猶謂尚有良心者乎？總由一人倡之，眾人附之，予官府以不得不從之勢，不能不于黃玉有深咎焉！……爾黃玉可勸率各商竭力辦公，毋剝我番，無擾我民，無悞我餉，俾商番有相安之樂，則本縣所厚望也。⁹¹

不肖商人對新任官員尚且如此刁難推諉，不難瞭解其對「不識不知」原住民的剝削和戕害。此外，商人有時還會勾結通事對原住民社會進行剝削和危害，史冊歷歷可見。高拱乾《台灣府志》有記：

有司只按總額徵收，番亦愚昧無知，終歲所捕之鹿，與夫雞、犬、牛、豕、布縷、麻菽，悉為社商所有，間有餉重利薄，社商不欲包輸，則又諉諸通事，名為自徵，通事額外之剝削無異社商，雖屢禁

88 見鄭其照，〈台灣番社考〉，引自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輿地彙鈔》（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38。

89 季麒光，〈詳陳贖社之難文〉，引自《政事集》，頁168-169。

90 季麒光，〈論社商黃玉等文〉，引自《政事集》，頁223。

91 季麒光，〈論社商黃玉等文〉，引自《政事集》，頁223。

懲，未盡改也。⁹²

又如連橫《台灣通史·撫墾志》云：

初，歸附番社利用通事，又有社商以攬其餉。番之互市，社商主之，每事朘削，朋比為奸。⁹³

社商和通事不僅聯手在經濟上對原住民進行剝削，更有甚者，還公然登堂「妻其室而逐夫於外者」；⁹⁴平時則「事無巨細，悉呼番人男婦孩穉，供役其室無虛日，……有過必撻。」⁹⁵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到台灣採硫，沿途經過諸羅縣境許多番社，對社商和通事的惡行知之甚詳，便稱其為「社棍」。⁹⁶此外，從其〈土番竹枝詞〉中亦可窺得社商對原住民的剝削之嚴重，詩云：

竹弓桮矢赴鹿場，射得鹿來交社商；家家婦子門前盼，飽惟餘瀝是頭腸。⁹⁷

描述原住民將射得之鹿交付社商，惟頭、腸無用，得與妻孥共飽之情狀。因此，當局若未善加懲治這些「社棍」，甚至可能因而激起原漢衝突，對社會治安和地方平靖影響頗大。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吞霄番亂」，便是因為社商對原住民「征派無日」所致。⁹⁸

季麒光到諸羅縣未及半年，瞭解到賸商制度之種種弊端，於是為文上陳朝廷賸餉之難處，並且下諭社商不得魚肉鄉里、殘民以逞。然而，一時之間卻也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亦只能再三告誡社商「竭力辦公，毋剝我番，無擾我民，無悞我餉，俾商番有相安之樂」。

92 見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台灣府志·賦役志》之「總論」，頁287。

93 見連橫，《台灣通史·撫墾志》，頁419。

94 見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風俗志》之「雜俗」，頁249。

95 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下（台北市：台灣銀行，1959），頁36。

96 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下，頁37。

97 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下，頁44。

98 吞霄社通事黃申為賸社，「征派無虛日，吞霄番苦之。……二月（按：康熙三十八年），番將獵，申令納稅而後行。番固怨申，遂殺之，及夥數十人。」後經官軍聯合其他原住民部落討之，亂平卻「頗死傷」。參考白連橫，《台灣通史·撫墾志》，頁418。

（二）差役沈重

台灣開發以來，原住民一直是島上最弱勢的族群，除納稅之外，還要負擔許多額外的公差和勞役，甚至要參與作戰。沈重的負擔往往逼使原住民起而反抗，史冊所載之「番亂」，大多肇因於此，如明鄭末期的「竹塹番亂」便是顯例。⁹⁹從季文〈請禁夫車文〉和〈請禁撥用土番文〉二篇，不難看出當時原住民差役沈重的情形。

首先，在〈請禁夫車文〉言及原住民差役之重的情形，其曰：

近今差役煩多，嗟此番民，男則驅車送報，婦則砍竹割薪，日無寧晷。而又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莫可控訴。……北路之社雖多於南，而南路之番實多于北，何以南路之役少而北路之役煩？¹⁰⁰

從上述可知兩點訊息：其一，男性原住民擔任「驅車送報」的公差，而女性原住民則必須負擔起「砍竹割薪」的工作；其二，當時原住民人口南多於北，但北路（諸羅縣）的差役卻多於南路（鳳山縣）。

季文所言「驅車送報」正是當時原住民差役的大宗。「驅車」也就是幫官方或其他公人擔任駕車的任務。由於當時馬在台灣並不多，¹⁰¹而且此時台灣的路況，除府城及少數地區之外，大多不適合馬車行走。因此，這裡的「車」為牛車。郁永河北上採硫時，沿途駕車和行李的搬運等公差，皆由原住民任之。¹⁰²由原住民擔任駕車任務，主要是借重其吃苦耐勞、通曉社語及熟悉路徑之便利。而「送報」則是替公家傳遞文書或消息，主要是靠原住民的腳力。季麒光有云：「小番羣宿於廨，以供遞送往來之役。」¹⁰³《諸羅縣

99 永曆三十六年（1682），台灣北部竹塹社原住民因明鄭苛役而群起反抗。「初，軍戍雞籠者，遇北風盛發，船不能往，則命土番轉運。沿途供役，土番苦之，督運者又嚴為驅策，遂相率為亂，殺通事，掠糧餉。」見連橫，《台灣通史·撫墾志》，頁417。

100 季麒光，〈請禁夫車文〉，引自《政事集》，頁196。

101 據郁永河云：「地（按：台灣）不產馬，內地馬又艱於渡海，……文武各官乘肩輿，自正印以下，出入皆騎黃犢。市中挽運百物，民間男婦遠適者，皆用犢車。」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上，頁13。

102 郁永河自云：「車以黃犢駕，而令土番為御。」以及「至溪所，眾番為戴行李，沒水而過。」分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中，頁17、20。

103 見季麒光著、李祖基點校，《文稿·番俗紀》，頁117。

志》亦有記曰：

縣治以南，聽差者曰「咬訂」；諸羅山、打貓各社，謂之「貓踏」。約十二、三歲外，凡未室者充之；立稍長為首，聽通事差撥。夜則環宿公廨，架木左右為床，無帷帳被褥。……斗六門以北曰「貓鄰」。¹⁰⁴

此外，黃叔璥曾描述原住民「送報」時奔跑的情景，其云：

麻達（按：原住民未娶者）走遞公文，……展足闊捷，腳掌去地尺餘，撲及其臀；沙起風飛，……瞬息數十里。¹⁰⁵

因為原住民善跑且「捷于奔馬」，故當時台地「悉用咬訂、貓踏、貓鄰」¹⁰⁶或「麻達」跑遞公家消息。

季文又云「南路之役少而北路之役煩」，南北路原住民何以產生「勞逸不均」的情形？主要原因在北路官道所經皆為平埔族部落。季麒光指出：

查新港、加溜灣二社為一邑之孔道。凡奉差而至者，非道府之員役，及鎮營之目弁。……臨行供應夫車，……故兩社之中日撥數起，或二三十起，種種不法，在憲台無由俯察，而卑縣末員下吏，力難禁飭。¹⁰⁷

蓋明鄭時期和清領之初，台南府城以北泰半仍處於草莽未闢之地，漢人稀少，沒有任何城鎮之設，即便是明鄭時期天興縣治所在地的佳里興（今台南縣佳里鎮），在季麒光到任時，也不過是「形勢窪下，村烟寥落，地闊風高，砂低龍弱，實非吉土」¹⁰⁸的荒涼景色。當時諸羅縣主要的統治對象為平埔族原住民，故當官方需要徵召各項公差時，服役者自然為平埔族人。

而南路（鳳山縣）在明鄭時期為了解決軍糧問題，命令軍隊就地屯田，

104 見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風俗志》之「雜俗」，頁247。

105 見黃叔璥，〈台海使槎錄·番俗六考〉，頁96。

106 見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風俗志〉之「雜俗」，頁247。

107 季麒光，〈請禁夫車文〉，引自《政事集》，頁196。

108 季麒光，〈詳建縣治文〉，引自《政事集》，頁209-210。

從今日的台南到高雄之間，早已開發出幾個大型屯墾區，如半屏里（今高雄市楠梓區後勁和右昌一帶）、觀音里（今高雄縣燕巢鄉、大社鄉和仁武鄉一帶）、興隆里（今高雄市左營區）和大竹里（今高雄市前鎮區）等皆是。¹⁰⁹這些屯墾區既是明鄭武力的重鎮，同時也是漢人活動中心。入清後，漢人在屯田的基礎上，南路的開發已經卓然有成，原住民早已被迫遷徙離去。¹¹⁰因此，南路原住民的勞役負擔自然要較北路少上許多。

其次，季文〈請禁撥用土番文〉提及原住民的勞役沈重至「計番一名，一月有十二日之差；且文武衙門，撥番工役，聽候差遣，不獲歸耕。」¹¹¹試想原住民在一月之中，超過三分之一時間擔任各項公差勞役，如何能順利從事耕種及漁獵活動。如此一來，不僅其正常生活作息受到干擾，抑且無法按期輸餉。所以，季麒光請求「有土番現在衙門者，即令撥回。俾得竭力耕作，庶上不悞國，下不累番。」¹¹²雖然季氏去除原住民苛役的用意，主要是為了不誤國賦，但其中亦可見到其愛「民」如子的一面。

後來，高拱乾也注意到原住民勞役過重的現象，遂發出禁令曰：

更有各衙門差役兵廝經過番社，輒向通事勒令土番撥應牛車，駕駛往來。致令僕僕道途，疲於奔命；妨其捕鹿，誤乃耕耘。因而啼饑呼寒，大半鵲首鵲面。至於白取竹木，以供私用；責令駝送，恬不知怪。種種夙弊，均應痛處嚴革，難再一日姑寬。……為此示仰台屬官役、軍民人等知悉：……凡經過各番社，不許勒令土番抽撥牛車、擅取竹木，苦累番民。倘有仍踵前轍，一經訪聞，官則揭報、役則立拿杖斃，斷不姑貸。¹¹³

109 參考自曹永和，〈鄭氏時期之台灣墾殖〉，引自《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市：聯經，2002），頁281。

110 參考自黃智偉，〈省道台一線的故事〉（台北市：貓頭鷹，2002），頁39。

111 季麒光，〈請禁撥用土番文〉，引自《政事集》，頁197。

112 季麒光，〈請禁撥用土番文〉，引自《政事集》，頁197。

113 見高拱乾，〈禁苦累土番等弊示〉，引自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撰，《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貳輯第九冊，頁175。本文寫成之時間，據《明清台灣檔案彙編》推測約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三十四年（1695）間，高拱乾時任福建分巡台廈道一職。

諭令遣詞用字頗為嚴峻，惟似乎收效不大。因為稍後郁永河採硫時，沿途所役公差仍是原住民。

沈重的勞役負擔嚴重地干擾了原住民的生活秩序，可以從郁永河所記得到進一步的反證。當郁永河北上途中，行經「偽鄭時期四大社」¹¹⁴區域時，隨行人員顧敷公向他提到「毆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見。」¹¹⁵可想而知，正因四社之一的「毆王社」遠離主要道路，該社的原住民才得以免去許多繁重的「驅車送報」和「砍竹割薪」等勞役徵召，比其他部落能夠更專心的從事生產，故「尤富庶」。這與現代因為交通便利而促進經濟繁榮的社會現象恰恰相反。

（三）原漢衝突

在台灣開發史上，整個明鄭時期到康熙中期屬於「漢番均勢期」。「均勢」的產生，在漢人移民勢力的增長以及政府的干預等因素所造成，後者包括縣級基層官署的設置、漢番事務的處理以及防隘、城圍、土牛堆和漢番界址碑的建立等條件。¹¹⁶季麒光知諸羅縣時，正處於該時期。為防止原漢衝突和妥善處理原漢之間的事務，他在〈安諭民番示〉一文中，首先告誡原漢雙方，「民不得欺番，番不得侮民」，接著又說：

近聞寄籍奸人，或傷殘牲畜，或侵損田園，或竊取蔬菓；甚至二三為羣，窺誘番婆，以致互分強弱，漸啟爭端，欲謀移徙。¹¹⁷

文中「寄籍奸人」即偷渡來台的漢人，這些移民在內地時多為無業之民，來台後遊手好閒，惹是生非，甚至成群騷擾原住民婦女，破壞社會治安。此輩游民因為沒有正式遷籍台灣，犯案後追蹤不易，成為治安的一大漏洞。對

114 明鄭時期平埔族四大社，分別為新港社（今台南縣新市鄉）、嘉溜灣社（今台南縣善化鎮）、毆王社（今台南縣將軍鄉）及麻豆社（今台南縣麻豆鎮）。參考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中，頁17。

115 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中，頁18。

116 參考自尹章義，〈台灣開發史的階段論和類型論——代序〉，引自《台灣開發史研究》（台北市：聯經，1989），頁9-10。尹章義將台灣開發過程分成五個階段：番人社會（荷人入據以前）；番人優勢、漢人劣勢期（移民初至）；漢番均勢期；漢人優勢期（康熙中期以後）；漢人社會（道光年間）。

117 季麒光，〈安諭民番示〉，引自《政事集》，頁227。

此，季麒光便指出「台灣之難，不難于治土番，而難于治奸民，更難于安良民以化奸民也。」¹¹⁸

季麒光將原住民「視同一體，無分彼此」，體念其「自認賸餉」並為之「請免襍差」，希望達到「安輯」原住民的作用，對其生存權益自然必須加以維護。於是，在文末還諭示原漢百姓要各自「安心採種」和「盡力耕耘」，以期做到「餉稅不虧」和「租賦無悞」，若不遵守法紀，「決不為爾等姑息也」。

持平而論，季文雖題為「安諭民番」，要求原漢之間不得互相傾軋，實則用意在於告誡漢人移民成分居多。蓋清人入台初期，將鄭氏軍民遷回大陸，台地人口一時呈現負成長。季麒光初履斯地，為充實賦稅起見，首要任務在招徠流民並安撫在地原住民，自然不願見到轄區「受廬之氓」和「土著之番」因為衝突而流失，導致財政惡化。然而，隨著漢人的逐步進逼，原漢之間「漸啟爭端」，以致於原住民「欲謀移徙」，原住民的生存權益已經有賴官府出面干預，顯見此時諸羅縣的原漢「均勢」正在崩解，而且「優勢」逐漸向漢人傾斜，從本文已經隱約可以解讀到這種過渡現象。

對於不服從命令的原住民，季麒光採取「先撫後剿」的態度。據上淡水通事王信回報，北部兩社因「不遵勸諭，欲相爭殺」，台灣大吏決定採取軍事行動，命令北路立即出兵鎮壓。季麒光向上級提出此時發兵有「四不便」之處，其四認為若徵用原住民前往助戰，「若使遠役于外，則耕種採捕必多妨悞」，建議往征官兵先「暫停調發」，讓他再次派遣通事前往「嚴加禁飭」。¹¹⁹剿撫和調度之間的斟酌，頗見季氏對原住民的人道關懷。

衡諸台灣開發歷史的過程，可說是一部「原住民衰退史」，原住民無論在文化、經濟和社會地位等方面節節敗退。清朝雖然對台灣原住民採取「保

118 季麒光，〈條陳台灣事宜文〉，引自《政事集》，頁177。

119 季麒光，〈詳議剿捕土番文〉，引自《政事集》，頁186-187。

護主義」，屢屢設限禁止漢人入山，卻依然無法阻止漢人越界開發。原住民在「形勢不如人」的情況下，只好被逼一再退縮、遷徙或「漢化」。季麒光的告示頗見關懷弱勢族群的精神，卻無助於歷史洪流將弱勢族群湮沒的現實。

六、結論

從季麒光《東寧政事集》的內容，可以觀察到清領之初諸羅縣的社會實況，其中呈現出賦稅、社會風氣和番政等問題。透過本文的論述所得，或可補方志和史料之不足。

首先，在賦稅制度上，清代承襲明鄭舊制，以致有賦稅過重之病，後雖有部分蠲減，仍高於內地許多。康熙年間對台灣的經營採取消極政策，如限制內地人民渡海來台和約束墾殖等，而對台地課以重徵之舉，殆含有「消極治台」的成分。此外，季文〈請免二十三年半徵文〉及〈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兩篇，對明鄭晚期雜稅有詳細的條述，可堪為研究明鄭晚期和清領初期的台灣經濟史之寶貴史料。在權貴占田方面，突顯出當時社會存在著濃厚的特權現象，不僅嚴重影響當地稅收和社會公義，田租代理者「狐假虎威」的不法行為，更直接挑戰地方官吏的行政權力。基層官員在執法時，尚須言辭剴切地向權力者陳訴原委，斯為當時台灣官場的奇特現象。季麒光為官忠藎，卻因縣內財政問題遭到調查而滯台多時，後來竟至於「向人曾乞米」的難堪處境。而台灣三大患之一的「蔭占未清」，始作俑者正是施琅，此與康熙皇帝的示惠和縱容態度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其次，在社會風氣方面，清代台灣社會素以「難治」著稱，其中以會黨作亂和分類械鬥影響治安甚鉅，而結拜和賭博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具有「推

波助瀾」的作用，是為肇禍之源頭。故季麒光防微杜漸為文告誡百姓禁絕惡習，惜接篆日短，終未能使社會風氣幡然改變。台地因兵制疏失和人為放縱，造成軍紀敗壞，亦是當時社會治安不佳的原因之一。吏治不良與軍紀鬆弛，也是間接促成台灣「難治」的原因。

再則，在番政問題上，可見到季麒光對弱勢族群的關照，並得窺強勢文化入侵弱勢文化的過程。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自古以來，文明人不僅以武力奪取原住民的土地，同時在經濟上亦不放棄對原住民剝削的機會。今日台灣原住民多數仍為社會弱勢，這些「文明人」實應負起大半的責任。

季麒光雖然出宰諸羅未及兩年，惟其任內既「能不避嫌怨，訂東寧新闢之章程」且「實心實意為民、番留有餘之利」，¹²⁰堪為民之父母。所以，台灣的府、縣諸志乃至《福建通志》等史冊，皆為其立傳。連橫將他收錄在《台灣通史》的〈循吏列傳〉，實為允當之舉。

（本文在撰寫季麒光「生平」及「去職」部分時，承蒙康靜宜學姐提供博士班報告資料，特此感謝！）

120 鄭廷桂，〈東寧政事跋〉，引自《政事集》，頁148。

參考書目（以作者姓氏筆劃為順序）

一、方志

- 1、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志稿》（台北市：成文，1983）。
- 2、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台北市：行政院文建會，2005）。
- 3、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台灣府志》（台北市：行政院文建會，2004）。
- 4、連橫，《台灣通史》（台北市：眾文圖書，1979）。
- 5、鄭喜夫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八職官志》第一冊（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二、專書

- 1、尹章義，《台灣開發史研究》（台北市：聯經，1989）。
- 2、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市：自由時代，1980）。
- 3、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輿地彙鈔》（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 4、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撰，《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貳輯第九冊（台北市：遠流，2004）。
- 5、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中譯本）上卷（台中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
- 6、余光弘，《清代的班兵與移民：澎湖的個案研究》（台北縣：稻香，1998）。
- 7、〔清〕康熙刻本、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 東寧政事集》（無出版地，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 8、施琅，《靖海紀事》（台北市：台灣銀行，1958）。

- 9、郁永河，《裨海紀遊》（台北市：台灣銀行，1959）。
- 10、施偉青，《施琅評傳》（廈門市：廈門大學，1987）。
- 11、施添福，《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1987）。
- 12、許雪姬，《清代台灣的綠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 13、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市：聯經，2002）。
- 14、莊吉發，《清史講義》（台北市：實學社，2002）。
- 15、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市：台灣銀行，1957）。
- 16、黃智偉，《省道台一線的故事》（台北市：貓頭鷹，2002）。
- 17、羅爾綱，《綠營兵志》（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

三、期刊論文

- 1、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編，《南瀛文獻》第二卷第一、二期合訂本（台北市：成文，1983）。
- 2、惠邨，〈清代台灣之租賦〉，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文獻》第十卷第二期（台北市：成文，1983）。
- 3、奧田彥、陳茂詩、三浦敦史等合著，〈荷領時代台灣農業〉，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銀行季刊》第6卷第1期（台北市：台灣銀行，1954）。
- 4、鄭喜夫，〈明鄭晚期台灣之租稅〉，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台灣經濟史十一集》（台北市：台灣銀行，1974）。

附表一：

李祖基校訂版本篇名	《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篇名	推測時間（西元）
〈請免二十三年半徵文〉		康熙二十三年（1684）
〈覆議屯田詳文〉		康熙二十三年（1684）
〈詳陳鹿皮缺額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1684 - 1685）
〈詳議勦捕土番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1684 - 1685）
〈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詳陳賸社之難文〉	〈嚴禁賸商向番民取利詐財〉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覆詳賸社之難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請詳北路添兵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覆詳北路添兵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三覆北路添兵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條陳台灣事宜文〉	〈台灣事宜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再陳台灣事宜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詳陳裝運砲位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詳請預定洋船〉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覆議留配船兵丁事文〉	〈覆議留配船丁事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詳止土官給割文〉	〈詳止土官給筭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詳禁舊錢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請禁夫車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請禁撥用土番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清查兵伍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密陳營盤累民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附上將軍施侯書〉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蔭丁漏糧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覆詳地粟定額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請免雜稅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申覆丈量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詳建縣治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覆詳新建縣治艸屋文〉	〈覆詳新建縣治草屋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回覆賠墊糖價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詳請署印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申覆糖皮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稟請工食帖〉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議援邊俸陞轉公揭〉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從《東寧政事集》考察清領之初的台灣社會問題

〈牒水師林副將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覆北路營詳議設造渡船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諭孫巡檢劄〉	〈諭孫巡檢劄〉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諭社商黃玉等文〉	〈諭社商黃玉等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嚴禁結拜示〉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天斷存祀等事〉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誣盜酷嚇等事〉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諭盜賊示〉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安諭民番示〉	〈定諭民番示〉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禁賭博示〉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抗示覬奪等事看語〉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倚營拐逃審語〉	〈倚營拐逃審語〉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懇恩批照等事看語〉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陳明賠累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條議招緝蔡機公等文〉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1684 - 1686)
〈預計糖額詳文〉		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1685 - 1686)
〈詳覆鹽課文〉		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 (1686 - 1687)